臺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九期
2008年12月　頁157～192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魏晉「方正不阿」及「與世委蛇」之人物論述的探索

——從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所揭示之兩種甯武子之愚談起

吳　冠　宏*

提　　要

本文依余嘉錫對「甯武子」之兩種理解的線索，從筆者以往掘發之兩種甯武子形象——「佯愚晦智」與「不避艱險」所形成之魏晉人與宋儒朱熹的參照系譜出發，以作爲切入余氏人物論述的重要視窗，由是透過「從不避艱險到方正不阿」與「從佯愚晦智到與世委蛇」這兩個面向的連結，延伸至余氏《世說新語箋疏》中有關「方正不阿」及「與世委蛇」之人物論述的探索，並由此突顯余氏箋疏《世說新語》的詮釋殊趣及價值向度。

經由余氏《世說新語箋疏》之部分與整體的詮釋對話，不僅可以進一步反省其箋疏之向度乃以宋學精神對治魏晉文化之得失，亦得以具體印證從「人物代稱」到「經典詮釋」之學術進路的方法效應，最後本文更將「方正不阿」及「與世委蛇」這兩種生命典型重新置於思想及文化的脈絡裡來進行反思，以充分體現筆者多年來綰合人物與思想的學術關懷。

關鍵詞：余嘉錫、方正、委蛇、人物代稱、經典詮釋

本文於97.09.10收稿，97.12.17審查通過。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iscourse on the Wei- Jin Characters of *Fangzhengbue* and *Yushiweiyi*: A Study Based on Two Types of Foolishness as Revealed in Yu Jiaxi's Commentaries on *Shishou Xinyu*

Wu Kuan – hung*

Abstract

Based on Yu Jiaxi's two readings of Ning Wuzi, this article explores his discourse on people and characters by drawing upon the present author's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two images of Ning Wuzi — "being a wise fool" and "bracing oneself for difficulties." As the author argues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two images together form a generic contrast to Zhu Xi and other Song Confucian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embarks a further investigation to trace the links between two transitions: from "bracing oneself for difficulties" to *fangzhengbue* (straightness and righteousness), and from "being a wise fool" to yushiweishe(following the crookedness of the world). By way of reconstructing these links, the article would like to extend previous discussions to Yu's discourse on *fangzhengbue* and *yushiweishe* as embedded in his *Commentaries on Shishou Xinyu*. In doing so, it also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Hwa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tends to show Yu's interpretive strategies and vision of values.

From Yu's interpretative remarks in *Commentaries on Shishou Xinyu*, whether taken separately or as a whole, we can discern his basic interpretative stance—he investigated Wei-Ji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ng Confucians' intellectualism. Such investigation, as argued in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fruitful occasion for us to critically reflect on methodological issues concerning those scholarly approaches that forge links between people/character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classics. All in all, this article resituates the two prototypes of beings, *fangzhengbue* and *yushiweishe*, within the contexts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cultural critique, an approach that the author has adopted in previous studies of characters and thoughts. Keywords: Yu Jiaxi; fangzheng (righteousness); weishe (crookedness); characters; interpretations of classics.

Keywords: Jiaxi Yu, *fangzheng* (righteousness), *wucishe* (crookedness), characters, interpretations of classic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魏晉「方正不阿」及「與世委蛇」之人物論述的探索

——從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所揭示之兩種甯武子之愚談起*

吳　冠　宏

一、前　　言

余嘉錫(1884-1955)《世說新語箋疏》一書集結了歷代各類史評的文獻，或商榷反省之，或援引申論之，因此對於《世說新語》的文本闡發與人物論述，比之於他所援引的史評者而言，可以說扮演著更爲積極參與的角色。關於余氏以史評進路箋疏《世說新語》的現象筆者已另文處理之，[1] 在此僅試圖連結筆者以往之研究案例——「甯武子」，以作爲進一步論述余氏世說學的延伸視角；除此之外，本文亦將依余氏對於「甯武子」之兩種詮釋的線索，擴及其《世說新語箋疏》中有關「方正不阿」及「與世委蛇」的人物論述，藉此連

* 本文承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輔助，係作者「從人物代稱到經典詮釋——以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爲研究線索」(97-2410-H-259-029) 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謹此致謝。

[1] 見〈余嘉錫以史評進路箋疏《世說新語》之現象詮釋及其文化意義初探〉一文，曾宣讀於第三屆「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 年 4 月 15 日），臺灣：東華大學原民院會議廳，頁 1-35 。本文乃在此文的基礎上對若干問題作進一步的析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不僅可以凸顯余氏箋疏《世說新語》的詮釋殊趣及價值向度，也正是筆者多年來綰合人物與思想的學術關懷之所在。

在魏晉人物品鑒的活動中，以古人比喻今人之人物代稱，可以說是常見的品鑒方式之一，而以「甯武子」爲喻，尤爲箇中值得關注的品鑒釋例，觀《世說・識鑒》第八則有載：「衛玠年五歲，神衿可愛。祖太保曰：……」劉孝標注引《晉諸公贊》稱衛玠祖衛瓘云：「……少以明識清允稱。傅嘏極貴重之，謂之甯武子」，即是當時善論才性的傅嘏借喻古人——「甯武子」以稱賞衛瓘的品鑒事例，博覽古書的余嘉錫遂據此文獻進一步點出漢魏人與宋儒對經典《論語》詮釋之異的問題：

以甯武子之愚爲詳愚，乃漢、魏人解《論語》與宋儒異處。[2]

余氏由甯武子之愚的線索豁顯出經典詮釋的比較視域，可謂深具旁通經典的宏觀視野，筆者即曾依此提點與連結，探源於《論語》與《左傳》的相關文獻，以進行漢魏（魏晉人）與宋儒（朱熹）對甯武子之愚不同理解的探索，最後歸結此差異現象乃「道」、「儒」思想影響下對歷史人物所形成的不同回響，[3]當時著眼在將此二愚置於中國儒、道兩家思想的文化視域予以考察，因此並未進一步思索余氏何以會形成如此視角的觀照？他對於這兩種甯武子之愚的詮釋判別，可否亦隱藏著評價差異？筆者深信，余氏此一案語的拈出，絕非一孤立獨有的理解現象，自當與其《世說新語箋疏》存在著「部分」與「整體」的詮釋循環 (the hermeneutic circle)，是以若能於兩者之間尋繹出相互證成、彼此照應的關係，當可使筆者在余嘉錫之世說學的論述基礎上，獲致更爲整全與深入的研究成果，至於「人物代稱」與「經典詮釋」的逢遇交會，亦能經此考察而有進一步的思考。

若依筆者以往之研究，魏晉人對甯武子之愚獨有體會的殊見——佯愚、晦

[2]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識鑒・ 8 ・箋疏 2 》（臺北：華正書局， 1989 年），頁 393 。

[3] 見拙作：《聖賢典型的儒道義蘊試詮・乙篇「甯武子——儒愚與道愚」》（臺北：里仁書局， 2000 年），頁 103-161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智，不僅是其尚「智」之時風與崇「道」之思潮交織下的投影，也與魏晉士人習於保身免患之術乃至以仕爲隱、與時浮沉的生命向度攸契相關；而朱熹志承道統，於儒門每有深會，因此對於晉人所體之「愚」，每加以責難批評之，所謂「若都不管國家事，以是爲愚，豈可以爲不可及也」、「『可力飲此，勿預時事。』如此之愚，則人皆能之也」，朱熹當是剋就俗解之失而發，認爲甯武子之愚，向來爲人所誤解，故尤須再三致意，以力挽舊說之弊，並希望弟子能眞明甯武子之愚，學習這種剛勁行義、勇於自任以渡危濟艱的精神，而非魏晉人順時委蛇、只求避禍的行徑。[4] 依此可見朱熹於甯武子之愚的確有異於魏晉人的詮釋，而余氏在此提點出兩端的差別，除了對學術思想深具演變發展的眼光之外，可否亦隱涵其文化關懷及價值訴求的寄託呢？

余嘉錫曾經有「宋人史學勝清儒」之說，[5] 周祖謨亦云：「至於立身處世則深受宋代儒學的影響。他秉性剛直，尤嚴義利之辨。注重知人論世，砥礪名節」、「對魏晉士大夫佯狂避世以自保，高唱無爲以求安的矛盾心理狀態均作了深刻的剖析」、「又說：『凡事當明辨是非，不可從風而靡，不可見利而忘義。當有所爲，有所不爲。』他立言謹行，殷殷期望於後學者如此，都來自於宋學」，[6] 依此看來，余氏對於漢魏（魏晉）人及朱熹詮釋甯武子之愚雖未直接訴諸高下的判斷，然在其自覺之宋學精神的秉持下，余氏與朱熹批判魏晉人曲解甯武子之愚當有異曲同工之妙。筆者認爲此一連結值得深致玩味，因爲若依此線索探入，余氏所提點之「甯武子」所展現出中國文化史上兩種截然對反的歷史圖像，就不僅是儒、道思想影響下的不同投影而已，亦涵藏著他的價值立場，展現出余氏經典詮釋的整體向度，自是切入其人物論述的重要視窗。

有鑑於此，本文將從這兩種甯武子形象——「佯愚晦智」與「不避艱險」所形成之魏晉人與宋儒朱熹的參照系譜出發，對應到余氏《世說新語箋疏》中

[4] 同註 3 ，頁 126-127 。

[5] 見周祖謨：〈余嘉錫先生傳略〉，收入《余嘉錫文史論集》（長沙：岳麓書社，1997 年），頁 668 。

[6] 同前註，頁 679 、 675 、 681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正不阿」及「與世委蛇」之相關人物論述，以延伸至其箋疏《世說新語》之詮釋向度的反省，進而使這兩種生命典型在「探源」與「察流」的脈絡裏獲致思想及文化上的意義，並由此印證從「人物代稱」到「經典詮釋」之學術進路的方法效應。

二、從「不避艱險」到「方正不阿」的人物論述

根據余氏「以甯武子之愚爲詳愚，乃漢、魏人解《論語》與宋儒異處」的提點，「宋儒」對甯武子之愚的理解義涵，自是不容忽視的線索，觀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公冶長》「甯武子」一章，對於孔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有以下的重要注釋：

>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7]

朱子認爲文公有道之際，甯武子所以無事可見，當是於國家政治安定之時，其行事克盡職守，自無異於尋常賢臣之所爲；但到了成公無道而失國之際，識時務的智行之士，莫不遠避以免禍，唯甯武子仍從義之所在，隨侍成公，不避艱阻，歷經諸多艱險危難，終使成公圓滿復國。當此之時，成敗禍福難料，甯武子這種選擇與舉動，在常人看來，豈非愚者的行爲？然而他最後還是能保其身，並成濟其君，故孔子讚之云「邦無道則愚……其愚不可及也」。綜觀《左傳》所載甯武子之行誼事跡，於衛國於成公可謂盡忠竭智，從其「武」之謚號觀來，「剛彊直理」即是對其一生德誼之評斷，而朱熹所謂「不避艱險」，彰顯的正是儒者這種絕不避事，勇於擔當的剛健精神。依此看來，甯武子之忠，乃時人所共識，孔子則特從「智」、「愚」之目著眼，進而由「愚不可及」凸

[7]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頁 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顯甯武子的難能可貴，朱子以爲此當有破常見、矯俗弊的深意，在此脈絡下的甯武子之愚，經由智巧之士的對顯，遂更能展現出不避險難又可以濟君成事，乃至智勇雙全的人格典型。[8]

我們可以在余氏箋疏《世說新語》的其他文獻中尋繹到有如宋儒朱熹詮釋甯武子之愚的論述身影，尤其是與「不避艱險」這種人格表現相類的「方正」人物，如《世說・方正》第三十三則有載：

>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9]

周顗面對傾撓朝廷之叛將——王敦的來勢洶洶，在衆人皆避難以求活之際，他卻能一無所懼，並且正言以對，故余氏箋疏此則有案：

> 伯仁臨難不屈，義正詞嚴，可謂正色立朝，有孔父之節者矣。《世說・方正篇》之目，惟伯仁、太眞及鍾雅數公可以無愧焉。其他諸人之事，雖復播爲美談，皆自好者優爲之耳。《晉書・孝友・顏含傳》曰：「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諒哉言乎！[10]

余氏稱賞周伯仁的臨難不屈，義正詞嚴，即所謂：「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也；〈方正〉第三十一則亦記載他責難王敦「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11]正義凜然之語，兩者可相互參看；余氏並由此反省〈方正〉所列諸多當時傳爲美談的方正事蹟與人物，認爲僅周伯仁、溫太眞、鍾雅數公可以當之無愧。除周伯仁之外，我們再觀〈方正〉第三十二則所載溫嶠（太眞）之言行：

>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眞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

[8] 同註 3 。
[9]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315 。
[10]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315 。
[11]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312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12]

王敦方謀篡逆，故有以不孝謗帝及廢帝之意圖，此則即透過王敦「奮其威容」、「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之龐大惡勢力的陣壓，來映襯溫嶠正色以言的勇決堅貞，〈言語〉第三十六則也載有溫嶠「忠慨深烈」的憂國之情，[13] 庾闡始作〈揚都賦〉，亦以「挺義之標」道溫嶠，[14] 故余氏見〈品藻〉第二十五則載：「世論溫太眞，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遂有以下的案語：

> 太眞智勇兼備，忠義過人，求之兩晉，殆罕其匹。而當時以為第二流，蓋自汝南月旦評以來，所謂人倫鑒裁者，久矣夫不足盡據矣。」

余氏標榜「忠義」與「智勇」的德行名目，不滿當時視溫嶠為第二流的評斷，認為有此現象乃汝南月旦評以來人倫鑒裁漸失其本所致，可見其對溫嶠之推崇。至於鍾雅，〈方正〉第三十四則有載：

>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遯逃以求免，

---

12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313 。

13 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歡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97 。

14 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 77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為『儁』，以『亮』為『潤』云。」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257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15]

鍾雅於國難當頭，獨在帝側，濟君於危，與朱熹所揭示甯武子之忠君作爲的精神，可謂相類，在此脈絡下，已非著眼於現實考量的進退，而是仁心義懷行所當行的承擔，〈方正〉第三十五則亦載：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蘇峻之難，庾亮難咎其責，鍾雅希望庾亮能不愧古人「荀林父」之將功折罪，收復京城，其不二之忠貞可想。從余氏所肯認的方正人物——周顗、溫嶠、鍾雅，我們似乎可從他們不同的際遇及事蹟中，看到一些共同的質素，在魏晉士風衰頹、節義不彰之下，他們卻依然能不畏艱險、忠君愛國，於家國有難之際奮力挺身、仗義而行，此皆順勢之智巧者所不爲，正可與朱熹所揭示甯武子之愚的精神相互呼應，皆爲濁世中的一股清流、黑暗中的一盞明燈。

以上所舉之方正人物，乃偏就權臣亂政與家國存亡之際的背景而發，其實余氏在箋疏《世說新語》中亦偏好一些能夠針貶魏晉以遺事自高或任誕違禮之士風的有識者，認爲他們都是能違時忤世、忠言逆耳以力挽狂瀾的方正之士，如〈崇有論〉的裴頠、[18]〈廢莊論〉的王坦之、[19]上奏導正士風的陶侃[20]……

---

15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品藻・25・箋疏 1》，頁 518。

16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315-316。

17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316。

18 「（崇有論）其言痛切有識，足爲成公張目」，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文學・12・箋疏 1》，頁 202。

19 「坦之隨事輒揩揩用力，故能成就其志業也」，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品藻・72・箋疏 1》，頁 538。另「坦之獨抱遺經，謹守家法，故能闢莊周之非儒道，箴謝安之好聲律。名言正論，冠絕當時。」見〈輕詆・21・箋疏 2〉，頁 842。

20 「陶公愛惜物力，竹頭木屑，皆得其用，既是性之所長，亦遂以此取人。……與王戎輩守財自封者，固自不同。」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儉嗇・8・箋疏 1》，頁 8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等，因爲遺事自高與任誕違禮的風潮是整個時代的流行趨向，就連周伯仁[21]與溫太眞，[22]都不免染此流習，尤能見此不流於俗見之方正人物的難能可貴。余氏相當肯認這種「守正不阿的儒者」，因此若這類人物遭受到輕詆，余氏必奮力爲之抵抗，如其處理支道林輕詆王坦之一則，[23]王坦之能闢莊周之非儒道，箴謝安之玩物失志，且圖政事之務實，余氏對此有極高的認同，認爲在與世浮沉、隨波逐流的名士裏，王坦之可謂中流砥柱；相形之下，余氏對於當時清談的名僧——支道林，卻語多無情的批判，在兩者交鋒下，「與時浮沉的名士」輕詆「守正不阿的儒者」必然遭到他強烈的反擊，余氏揚此——「王坦之」而抑彼——「支道林」之好惡鮮明的態度可謂表露無遺。[24]此外，批判何晏、王弼浮虛之罪的范甯，余氏也以「高識」視之，然而由於他篤信佛教，故余氏認爲他詆毀何、王，也僅是入主出奴之見而已，[25]余氏以儒家思想爲本位的價值立場昭然可見。

余氏認爲〈方正〉所載其他諸人之事，「雖復播爲美談，皆自好者優爲之

---

21 「伯仁名德，似不宜有此。然魏、晉之間，蔑棄禮法，放蕩無檢，似此者多矣。」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任誕・25・箋疏 1》，頁 742。

22 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六則及第二十七則皆言及溫嶠不拘細行的任誕言行表現。

23 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輕詆・21》：「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箸膩顏帢，淪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841。

24 「然由此可知坦之獨抱遺經，謹守家法，故能闢莊周之非儒道，箴謝安之好聲律。名言正論，冠絕當時。夫奏簫韶於溱洧，襲冠裳於裸國，固宜爲衆喙之所咻，群犬之所吠矣。若支遁者，希聞至道，徒資利口，嗔癡太重，我相未除。曾不得爲善知識，惡足稱高逸沙門乎？」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輕詆・21・箋疏 2》，頁 842。

25 「范武子湛深經術，粹然儒者。嘗深疾浮虛，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其識高矣。而亦拜佛講經，皈依彼法。蓋南北朝人，風氣如此。……今觀此事，始知范氏不惟世奉三寶；乃至八日請佛，亦復傳爲家風。其行持之篤如此。然則彼之著論詆毀王、何，殆猶不免入主出奴之見也乎。」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言語・97・箋疏 1》，頁 1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耳」，故余氏箋此，亦曾一一辨明，以還方正之實，如〈方正〉第二則稱賞宗承不交非類、不畏強權的松柏之志，[26] 余氏卻進一步指出：

> 宗承少而薄操之爲人，老乃食丕之祿，不願爲漢司空之友，願甘爲魏皇帝之臣。魏、晉人所謂方正者，大抵如此。東漢節義之風，其存焉者蓋寡矣。[27]

從宗承不願爲漢司空之友，卻甘爲「魏皇帝之臣」，而發東漢節義之風衰頹至此的感慨，可見易代之際可否忠於舊朝亦爲余氏方正人物的重要判準，在此訴求下，置身於漢魏之際與魏晉之際的諸多名臣名士，諸如漢魏之際的荀彧、華歆、陳群、王祥……等，魏晉之際的傅嘏、阮籍、山濤……等，都在這種判準下受到嚴厲的指責，故如〈方正〉第三則載「魏文帝受禪，陳群有慽容。帝答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群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一事，余氏箋此乃承李慈銘與洪邁的史評之見而發，[28] 余氏必定同意李慈銘「不識羞恥，顏孔厚矣」、「狗面人言，何足取信」的說法及洪邁「曹氏篡漢，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與「士風不競，悲夫！」的感歎，在歷來史評的匯集下，對陳群、華歆的作爲遂得以釋放出更大的批判力

---

[26] 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方正・2》：「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279-280。

[27]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方正・2・箋疏 2》，頁 280。

[28] 李慈銘云：「案陳群自比孔父，義形於色。可謂不識羞恥，顏孔厚矣！疑群爾時尚未能爲此語。與其子泰對司馬昭『但見其上』之言，皆出其子弟門生妄相附會。如華嶠《譜敘》稱其祖『歆以形色忤時』，狗面人言，何足取信！」《容齋隨筆》卷十曰：「夫曹氏篡漢，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爲公卿乎？歆、群爲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蓋自黨錮禍起，天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嘉錫案：華歆爲曹操勒兵入宮收伏后，壞戶發壁牽后出，躬行弒逆。是亦魏之賈充，何至「以形色忤時」！歆、群累表勸進，安得復有戚容？蓋客以爲出於其子孫所附會，當矣。容齋以二人爲一世之賢，猶未免流俗之見也。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方正・3・箋疏 1》，頁 281-2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道，可見對於這些身處易代之際的名臣，能不爲所屈者，余氏即給予極高的評價，若有所變節者，亦難逃春秋之筆的撻伐，尤其面對周旋於新舊勢力之間而見風轉舵以謀得最大私利者，余氏更是不留任何情面地予以披露，進行其人格的道德審判，使原本未必相關的篇目，都因此沾染著余氏強調出處進退之義與忠義方正之價值的論述，在在顯示余氏置身於異族佔領之下的時代危機與文化焦慮。

除此之外，余氏對於〈方正篇〉所載之方正諸人諸事，尤其是受限於當時門第之矜者，如〈方正〉第十二則載名氏楊濟及第十三則載羊琇皆拒與杜預同坐，[29] 第五十二則載王脩齡不須陶胡奴米[30] 等，亦指出他們乃是挾貴而驕，非方正之列，其他如二十四則的陸玩、二十五則的諸葛恢、五十八則的王述，皆當有衡量其門第後遂表現出不屈權貴的姿態，此即所謂「矜尚門第，愼重婚姻」者，[31] 自非余氏所認爲的方正人物。〈方正〉第五十七則載韓康伯語謝家無異王莽時一事，[32] 對韓氏看似義正詞嚴的論斷，余氏亦提出不同於時論的看

---

29 「晉書琇爲司馬師妻景獻皇后之從父弟，楊濟亦司馬炎妻武悼皇后之叔父，與杜預並晉室懿親。預功名遠出其上，而二人皆鄙預如此者，蓋以預爲罪人之子，出身貧賤，故不屑與之同坐也。此爲挾貴而驕，不當列於方正之篇。」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方正・13・箋疏 2》，頁 294。

30 嘉錫案：「侃別傳及今晉書均言範最知名，不知其人以何事得罪於清議，致脩齡拒之如此其甚。疑因陶氏本出寒門，士行雖立大功，而王、謝家兒不免猶以老兵視之。其子夏、斌復不肖，同室操戈，以取大戮。故脩齡羞與範爲伍。於此固見晉人流品之嚴，而寒士欲立門戶爲士大夫，亦至不易矣。賞譽篇曰：「謝太傅語眞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觀脩齡之拒胡奴，殆所謂風操太厲者歟？」《世說新語箋疏・方正・52・箋疏 1》，頁 327。

31 楊繩武云：「六朝風氣，論者以爲浮薄，敗名檢，傷風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實，復有不可及者數事：曰尊嚴家諱也；矜尚門第也，愼重婚姻也，區別流品也，主持清議也。」見顧炎武・黃汝成：《日知錄集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4 年）卷十三正始條引，頁 6。

32 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方正・57》：「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嘆曰：『此復何異王莽時？』」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3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法，即是透過韓氏與謝氏之關係的了解，主張韓氏有挾夙怨之嫌，所謂「安雖未必以此介意，而伯固已存芥蒂於胸中矣」，以作爲重新評斷韓氏此語的依據，由是一改流俗之見，這當是余氏對謝氏有功於國的肯定，他認爲謝安能以群體家國爲念，又有敗敵興國之業，故在箋疏中不時流露出對謝安的認同與支持，[33] 可見余氏論人之「方正不阿」，不惟在所論者當下之言行而已，他會納入整體的歷史情境與家國之興亡來進行通盤的掌握，故時能有跳脫時見與世論的表現。

如果跳脫儒家方正之道德人格的檢視眼光，而直接就《世說》來看，我們會發現《世說・方正》所載，實有它獨特的義涵。從魏晉重要的觀人之書《人物志》可知，他們以爲聖人「中和平淡」，而方正在此對顯下，僅爲偏材之流，不論所謂「中和平淡」或「偏材之流」，當時觀人著眼的不再是功業道德之實質所爲，而是天生氣稟任材適性的表現，故筆者認爲〈方正〉在《世說》的意義並不在「美德」，而重在「性格」的展露。觀〈方正〉所舉之人物，如第一則傳寫七歲的陳元方因客失約又對子罵父，最後以元方「入門不顧」收筆，將他方正不阿之性格表露無遺，第五十九則寫僅數歲的王子敬遇門生失禮，瞋目以對又「拂衣而去」，亦將王子敬與生俱來之方正性格充分朗現，《人物志》有云：「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可見以小孩的方正言行作爲記載的對象，其所著眼即在天生氣稟的自然發露，而非後天道德人格的涵養表現。

33 李慈銘云：「案桓溫桀逆，罪不容誅。當日王珣既被偏知，感恩短簿。謝公名德，亦以溫府司馬進身，故新亭之迎，九錫之議，當時懍懍，亦以不速斃爲憂。乃至告終，哀榮備盡，蓋王、謝二族，世執晉柄，終懷顧己之私，莫發不臣之跡。」余於此有案語加以反駁而云：「至於謝傅處置桓氏，實具苦心。若于溫身後便削奪官爵，除其典，不知何以處桓沖。設竟激之生變，如庾亮之于蘇峻，小朝廷何堪再擾乎？蕘客云云，又不審時勢之言也。」見《世說新語箋疏・言語・101・箋疏 2》，頁 152-153。另於〈尤悔〉第 16 則余氏論謝安治國之用心甚詳，所謂「謝安雖保全江左，功在弈世，而當其時，固衆謗群疑，極艱貞之會。大勳之成，良非易事」、「安之所以能安江左者，以其能用人，而不務張己之權勢也」，可參《世說新語箋疏・尤悔・16・箋疏 3》，頁 906-9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綜觀《世說・方正》，每透過兩端的衝突或緊張關係來呈顯方正人物的言行表現，君臣關係尤多，因爲在不對等的權力結構中，人臣能直言以對，益顯其不阿不畏權勢的表現；除此之外，方正的目光亦展現在各種人際關係間，如有走向「逕便出」（廿七則）或「拂衣而去」（三十七則、五十九則）或「不說而去」（四十則）之地步者，但亦有「遂爲矜契」（二十九則）、「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六十六則）的和諧狀況，由於沒有既定的價值立場，因此反而可以多元吸納與包容，使各種不同的方正言行作爲、神采風姿，都可以栩栩如生地展現出他們多樣迥異的性格特徵與存在面貌，諸如阮瞻執無鬼論以破除迷信，表現出一種不畏俗見的精神（廿二則）；簡文癡心於王長史當出仕東陽，至死不逾（四十九則）；「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廿四則）、「小人都不可與作緣」（五十一則）、「王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五十二則）諸語無不流露出魏晉名士不因環境而稍減其於門當戶對及不交非類的堅持；嵇紹「不輕舉止」以操樂（十七則）、王子敬「不輕舉止」以題版（六十二則）；他如阮裕的隱居以務遠時流（五十三則、六十一則）、羅含「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的耿介不語（五十六章）、孔群（三十六則、三十八則）與向雄（十六則）不忘舊辱的自尊自重，第二十六則周嵩與第二十則王衍之「不與人親狎」，不論是有稜有角，敢與人不同，有所堅持，敢言人所不敢言，理智而不爲情所溺……等，《世說・方正》可以說都做了豐燦生動的傳寫。

放眼《世說・方正》，體現出不少魏晉人物品鑒的共同基調，諸如第二十八則何充的「晏然，神意自若」、第六則夏侯玄的「臨刑東市，顏色不異」、第三則陳群「有慊容」及其「猶義形於色」的陳述……等，皆著重於方正人物的神姿風采。諸如六十四則王爽「風流秀出，臣不如秀；忠孝亦何可以假人！」、四十七則王述「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四十六則王坦之「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二十三則周伯仁「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十八則「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十五則「時論乃云勝山公」……等，皆好論人物品第之高下長短。然不論是「神姿風采」或「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藻高下」，無不流露出魏晉文化的人物殊趣，或是彰顯自我，或是欣賞他人，要在人物當下的言行風神與特色表徵，可見他們選入的判準並不在整體人格的評斷，而僅是片斷生命的具現發露，故其所著力乃在言談之吉光片羽與人物之剎那風采，回溯此風采內具的氣稟特性而言方正，自非一頂天立地的浩然正氣或感天地泣鬼神的悲壯人格。

至於魏晉人如何看待「方正」品格，這種善德之言行的背後，可否有其他支援的因素潛藏其間，也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考察，在此試舉兩例以窺探《世說・方正》的可能視角：

>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34]

羊忱性貞烈，以矢退趙王倫之使者，表現出不為權勢所屈的剛正，然撰者指出羊忱「深懼豫禍」，故其所謂方正乃預知趙王倫後患之深智使然，〈方正〉第三十則亦載有另一則周伯仁事件：

>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後數日，詔出周，群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35]

此則前大半段透過周伯仁勇於抗上的正直之聲，展現出周伯仁方正不阿的風範，然由後段周伯仁的自白，我們進一步看到這「不畏之勇者」的背後仍存有一「料事之深智」，這些現象無不透顯著表現方正性格與言行的魏晉人物，「深智」仍是其不容忽視的言行樞機。

---

[34]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303 。
[35]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311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從「佯愚晦智」到「與世委蛇」的人物論述

魏晉人對甯武子之愚的理解，可從晉人杜預的《春秋左氏傳》集解中找到最爲直接的線索，觀杜預注「不答彤弓」一則云：

> 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36]

杜預以爲《左傳》文公四年所記「不答彤弓」一則，甯武子知之而佯以爲不知的作爲，當是孔子稱美所據，此乃依孔安國「詳（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的說法而來，並進一步以「賦詩」一事證之。實則視甯武子之愚爲「佯愚」，不獨孔、杜爲然，可說是魏晉人的定見，觀皇侃《論語義疏》引魏王朗及晉孫綽之言可知，如王朗以爲「佯愚」即是「韜光潛綵，恬然無用」，特意將自己隱藏起來，不使光芒外露，故看似無用，沒有任何可稱述的表現，實則其德已超乎「智」、「愚」名目之外，並非智愚之目可以涵蓋，故特別提擢「佯愚」爲更富深智的表現；孫綽則從人情貴智飾之趨，反襯去華以保性、晦智以藏名的深智，來解釋甯武子之愚。[37] 可見孔安國時，僅以「佯愚似實」稱之，至魏晉則將全身保性、虛名去智的思想納入「佯愚」的義涵，甯武子之愚遂成深智的典型。

除了《論語》之相關注疏的線索之外，余嘉錫指出傅嘏以「人物代稱—甯武子」來稱賞衛瓘，亦爲當時具體的品鑒例證：

> 衛瓘弱冠爲魏尚書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疏，甚爲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38]

魏明帝死後，少子齊王芳繼位，司馬懿與曹爽受詔共同輔政，然初時大權實握

---

[36]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頁 306。

[37] 王朗與孫綽之說法，俱引自《論語集解義疏》（臺北：廣文書局，1977 年），頁 168。

[38]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36（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0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曹爽手中，此「權臣」即指曹爽，傅嘏黨司馬氏而與曹爽派何晏不和，因微事以免官，是以對衛瓘能「優游其間、無所親疏」的行徑，深贊其智，乃以「甯武子」稱之。細觀衛瓘的其他言行，或可更明傅嘏之評，衛瓘於鍾會欲叛之際，詐疾以免禍，又曾託醉撫床曰：「此座可惜！」以勸武帝勿立惠帝爲太子，皆是一種深藏僞飾類似佯愚之術的表現，他早年雖爲曹氏之官，但能先見司馬氏與曹氏勢力消長成敗之幾兆，因此對曹氏採「優游其間、無所親疏」的態度，此中即需要佯愚晦智之術，而深體此術之衛瓘遂成爲魏晉人所理解之甯武子的化身。

衛瓘這種優游以免禍、詐疾佯醉的行徑，乃魏晉名士所常行，史傳載：「（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庾敳）雖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爲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敳常靜默，故憂喜不至也」、「（裴楷）時楊駿執政，優游無事，默如也」、「（山簡）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阮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謝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敦有不臣之跡，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詠，卒歲而已」。[39] 可見魏晉名士身處亂世困局（魏晉之際、王室交爭、四方寇亂、權臣專政），每以智而能愚、玄默無爲、優游寄遇、唯酒是耽的態度面對，而終能不與世事、免患保身，亦可謂佯愚晦智之一法。在這種「不屑政事」之行爲的背後，實是他們已能先見禍端，而思有以避之使然，故其「憂喜不至」的「約情」風貌、恬然無用的「崇愚」之舉，不僅非「不及情」與「無知」的鈍昧，反而是一種默言藏情、晦智以善保其身之深智的表徵，可以說即是魏晉詭譎政治下的產物，他們知道不可行，勢不可爲，故與世委蛇、隨順時流，是以其會心於甯武子，正有其時代無可如何

[39] 以上所列引自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99 、《世說・賞譽》第 44 則劉注引《名士傳》、《晉書》卷 35 、卷 43 、卷 49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悲感。[40]

不過這種以酒廢職的佯愚之舉，本有解憂的積極意義及避禍以保身的具體目的，唯流風所及，此權宜之行卻也漸成蕭然無累、以仕爲隱之生命情調的追求，進而以此爲尚，成爲一種風流的表徵，是以身居要職者，每雅崇拱默，而以遺事爲高，或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故「理事爲俗吏」、「從容爲高妙」，名士們每標榜「不與時務經懷」的風雅，恬然無用以逍遙適性，「在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遂成爲他們心尚玄遠逍遙，又不離世職俗務的寫照，這不僅爲「遺事無累」、「體玄識遠」之生命風格的發露，更是會通兩端之玄智在現實生活中的具現，故能周旋於高俗、仕隱、出處之間，而「通隱」、「朝隱」、「市隱」之說亦在此風尚下孕育而生。

依此可見，從「佯愚晦智」到「遺事無累」，這兩種生命型態固有各自不同的形成因由，前者起因於政局之不安所形成的處世深智，後者衍生爲一種士人的文化風尚及生活情調，然兩者之間卻未必是衝突而不能相容的，尤其到了東晉，更形成合流而難以分判的現象，我們若要嚴格加以殊別之，「佯愚晦智」比較偏向魏晉老學的影響，是對治現實的政治智慧，「遺事無累」則當是魏晉莊學下的產物，雖亦爲一種政事上的作風，但實已跳脫傳統政治之常軌而轉向一種生活的美學與情調，然不論是老學或莊學，在魏晉士人之玄智玄風的發露下，都能展現出一種與世委蛇的處世智慧與生命姿態，而成爲魏晉文化及時代精神的重要表徵。

向來以儒家思想爲矩矱的余嘉錫，面對魏晉這種佯愚晦智乃至遺事無累的人物現象，終究是「批判」多於「同情」。觀余氏批評山濤「此眞所謂心存事外，與時俯仰」、[41]批評王衍之徒「蓋自中朝名士王衍之徒，祖尚浮虛，不以物務自嬰，轉相放效，習成風尚。以遺事爲高，以任職爲俗，江左偏安，此弊未改」、[42]批評孫綽「綽所以自許，正是晉人通病。『不與世務經懷』，干寶

[40] 同註 3 ，頁 120-122 。
[41]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 11 ・箋疏 2 》，頁 680 。
[42]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方正・ 46 ・箋疏 3 》，頁 324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謂『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者也」[43]……皆與朱熹對魏晉人的批判何其神似。在此可從余氏對於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山濤的評斷，作爲其觀人的重要判例，如〈品藻〉第七十一則談及「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劉注引孫盛《魏氏春秋》「於時之談，以阮爲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糾之，余氏頗不以爲然地指出「乃心魏室」的嵇康當爲七子最優，而阮籍志求苟免、山濤與時俯仰，自難與菲薄權奸之嵇康相抗衡，觀余氏對三者的評論，可以看出他對嵇康抗直不容的肯認，視之爲東漢節義之遺風；相形之下，阮籍與山濤都受到嚴厲的批判。[44]

就阮籍而言，史傳稱其「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又有「至愼」的美稱，可見他當是深諳詳愚晦智之術者，故余氏認爲他「智雖足多，行固無取」，尤其是置身於魏晉之際，阮氏所表現出來游移周旋於兩端的作法，余氏特引葉氏《避暑錄話》「佯欲遠昭而陰實附之」的說法揭開其「遺落世事」的詭譎面紗，以洞察阮氏揣摩兩端情勢以避禍圖存的幽隱心跡，[45]余氏又進一步透過當時相關的事蹟—

---

[43]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品藻・ 36 ・箋疏 1 》，頁 522 。

[44] 嘉錫案：竹林諸人，在當時齊名並品，自無高下。若知人論世，考厥生平，則其優劣，亦有可言。叔夜人中臥龍，如孤松之獨立。乃心魏室，菲薄權奸，卒以伉直不容，死非其罪。際正始風流之會，有東京節義之遺。雖保身之術疏，而高世之行著。七子之中，其最優乎！嗣宗陽狂玩世，志求苟免，知括囊之無咎，故縱酒以自全。然不免草勸進之文詞，爲馬昭之狎客，智雖足多，行固無取。宜其慕浮誕者，奉爲宗主；而重名教者，謂之罪人矣。巨源之典選舉，有當官之譽。而其在霸府，實入幕之賓。雖號名臣，卻爲叛黨。平生善與時俯仰，以取富貴。迹其終始，功名之士耳。《世說新語箋疏・品藻・ 71 ・箋疏 1 》，頁 537 。

[45] 《避暑錄話》上云：「阮籍既爲司馬昭大將軍從事，聞步兵廚酒美，復求爲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宴必與。以能遺落世事爲美談。以吾觀之，此正其詭譎，佯欲遠昭而陰實附之。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也，何禮法之士疾籍如仇，昭則每爲保護，康乃遂至於殺身？籍何以獨得於昭如是耶？至勸進之文，眞情乃見。籍著〈大人論〉，比禮法士如群蝨之處褌中。吾謂籍附昭乃褌中之蝨，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淩、毋丘儉等一得志，籍尚有噍類哉？」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729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何晏等被誅、司馬昭求婚、勸進文與人物——高鄉貴公、諸葛誕，再探阮氏置身於兩端政治勢力下的投機心理，並強調阮籍「不顧名教如此，而不為清議所廢棄者，賴司馬昭保持之也」，[46] 在此視域下，遂主張「大抵嗣宗之學出于老莊，務求自全，以柔保身，以傲慢世，雖鄙棄奸雄，狎司馬昭如鷗鳥，而亦不願以身許國，故其言如此。凡嗣宗之詠懷皆以此意讀之可也」，[47] 根據余氏的論述，阮籍身陷魏晉之際詭譎多變的政治利害網絡中，不見忠義，亦無原則，成為僅求全身遠害之流。若與李豐相較，史傳載「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於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48] 可見魏晉之際的李豐，依違於曹氏與司馬氏而無有適莫，

[46] 嘉錫案：觀阮籍《詠懷詩》，則籍之附昭，或非其本心。然既已懼死而畏勢，自暱於昭，為昭所親愛。又見高貴鄉公之英明，大臣諸葛誕等之不服，鑒於何晏等之以附曹爽而被殺，恐一旦司馬氏事敗，以逆黨見誅。故沈湎於酒，陽狂放誕，外示疏遠，以避禍耳。後人謂籍之自放禮法之外，端為免司馬昭之猜忌及鍾會輩之讒毀，非也。使籍果不附昭，以昭之奸雄，豈不能燭其隱而遂為所瞞，從而保護之，且贊其至慎，憂其毀頓也哉？觀其於高貴鄉公時，一醉六十日以拒司馬昭之求婚。逮高貴鄉公已被弒，諸葛誕已死，昭之篡形已成，遂為之草勸進文，籍之情可以見矣。世之論籍者，惟葉氏為得之。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729 。

[47] 文選二十三阮嗣宗詠懷詩，顏延年注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發茲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義，略其幽旨也。今案：詠懷詩寓意深遠，誠未可就字句之間加以穿鑿，然其意亦有顯然可見者。如第十四首云云：「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回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罄折忘所歸？豈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案：尸子云：「鴻鵠之鵠，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嗣宗詩中用此，固明明指司馬氏也。……然昭嘗其子炎求婚，而嗣宗沈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以此自遠，蓋懼高貴鄉公之英明，大臣諸葛誕等之不服，恐昭一旦失勢見討，如董卓曹爽，而己為蔡邕何晏輩之續耳。故曰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也。大抵嗣宗之學出于老莊，務求自全，以柔保身，以傲慢世，雖鄙棄奸雄，狎司馬昭如鷗鳥，而亦不願以身許國，故其言如此。凡嗣宗之詠懷皆以此意讀之可也。見《余嘉錫文史論集・讀已見書齋隨筆齋阮籍詠懷詩》，頁620 。

[48]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夏侯玄傳》注引《魏略》（北京：中華書局， 2003年），頁301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遂有「游光」之稱，[49] 馮承基承此文獻而有：「（李豐）仍屬其『游光』主義，欲兩面討好。不知司馬氏既誅曹爽以後，大權在握，局面已定，不再容他人徘徊觀望。關於此點，豐似不及阮籍所見爲通透」、「阮籍前半仕宦生涯之作風，吾人姑可謂之爲中間偏曹。及曹爽既誅，阮籍較爲機警，不復如李豐之游離」的論斷，[50] 即視阮籍有通透之機智，故能隨勢轉移，而得以免禍續存，李豐卻繼續扮演偏曹之游離角色，最後只好遭致被害的下場，相較於馮氏著眼於阮籍之機智，余氏則向稱李豐爲忠臣，[51] 他在論述立場上似有以舊朝爲重而恥周旋免死之智者。

另就山濤而言，〈賢媛〉十一則載山妻以「識度」賞山公，山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爲勝」，余氏亦由此發出不平之鳴，並從山濤的具體言行中，一窺其善於揣摩時勢、又能與時俯仰的居心，在此脈絡下，對於柔媚處世的山濤，竟以「功狗」稱之，可謂極盡鄙夷之能事，[52] 山濤不僅在其政治人格上倍

---

[49] 查四庫全書電子版中關於「游光」的資料，大體上有「火神」、「厲鬼」、「游光揚聲」諸義，可見「游光」一詞於文獻中並未普遍表現出「無有適莫」、兩面討好之意，《通雅》明指魏志謗語所記「李豐兄弟如游光」之「游光」爲厲鬼之意，或許「如游光」應如前文「熱如湯」、「冷如漿」般解爲「游如光」，故得以有「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機之意」，亦有可能取「厲鬼」之意，以「遁形」或「作怪」來形容李豐兄弟游離兩端的行爲。

[50] 見馮承基：〈論魏晉名士之政治生涯〉，《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二卷，第二期，頁 59-60 。

[51] 余氏云：「不知李豐爲忠臣，夏侯玄亦英傑，其人品皆非傅嘏所敢望。」見《世說新語箋疏・識鑒・ 3 ・箋疏 1 》，頁 388 。

[52] 嘉錫又案：《晉書》濤本傳云：「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鍾會作亂於蜀，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夫鍾會之爲人，嵇康所不齒，而濤與之款昵，又處會與裴秀交鬨之際，能並得其歡心，豈非以會爲司馬氏之子房，而秀亦參謀略，皆昭之寵臣，故曲意交結，相與比周，以希詭遇之獲歟？至爲昭居留守之任，以監視魏之王公，儼然以鍾繇、華歆自命。身爲人作伍伯，視宗室如囚徒，非權奸之私昵，誰肯任此？與時俯仰是矣。然實身入局中，未嘗心存事外也。《通鑑》八十四：「帝決意伐吳，賈充、荀勗、馮紞固爭之。帝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受余氏輕蔑，〈政事〉第八則載嵇康被誅後，山濤舉康子紹爲祕書丞，紹咨公出處，山濤言：「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余氏對此尤苛責再三，認爲「紹之死無可議」，然其失卻在「不當出仕」，由是勸之出者豈非陷人於不義，更將矛頭指向山濤，認爲山濤附會《周易》，正是魏晉人老易之學的表現，即是飾六藝以文姦言、率天下而禍仁義也，[53] 而此正如向、郭之調停堯與許、山林與當塗，形成有違於莊周之旨的新莊學，它絕非僅是其遜避免禍之心態下的產物，乃是名士爲了自全以求富貴，故衍生出處同歸、仕隱無異的論述，以作爲他們不明出處的自我開脫之辭，余氏認爲魏晉之徒取義於莊子，卻在山林與當塗之間進退失據，無以自處，頗能闡述魏、晉士大夫雖遺棄世事，高唱無爲，而又貪戀祿位，不能決然捨去的矛盾心理。[54] 這

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爲外懼，豈非箅乎？』」胡注曰：「山濤身爲大臣，不昌言於朝，而退以告人，蓋求合於賈充者也。」胡氏此言，深得濤之用心。蓋濤善揣摩時勢，故司馬氏權重，則攘臂以與其逆謀；賈充寵盛，則緘口以避其朋黨。進不廷爭，以免帝怒；退有後言，以結充歡。首鼠兩端，所如輒合。此眞所謂心存事外，與時俯仰也。傳言「濤再居選職，每一官缺，輒擬數人，視帝意所欲爲先」。其迎合之術，可謂工矣。操是術以往，其取三公，直如俯拾地芥，豈但以度量勝嵇、阮而已乎？見《世說新語箋疏》，頁681。

53 嘉錫案：紹自爲山濤所薦，後遂死於蕩陰之難。夫食焉不避其難。既食其祿，自不得臨難苟免。紹之死無可議，其失在不當出仕耳。……由斯以談，紹固不免於罪矣。勸之出者豈非陷人於不義乎！所謂「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尤辯而無理。大抵清談諸人，多不明出處之義。……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嘉錫案：山濤之言，義取諸此，以喻人之出處進退，當與時屈信，不可執一也。然紹父康無罪而死於司馬昭之手。《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此而可以消息，忘父之讎，而北面於其子之朝，以邀富貴，是猶禽獸不知有父也。濤乃傅會《周易》，以爲之勸，眞可謂飾六藝以文姦言，此魏、晉人《老》、《易》之學，所以率天下而禍仁義也。《世說新語箋疏・政事・8・箋疏2》，頁171-173。

54 嘉錫案：莊生曳尾塗中，終身不仕，故稱許由，而毀堯、舜。郭象注《莊》，號爲特會莊生之旨。乃於開卷便調停堯、許之間，不以山林獨往者爲然，與漆園宗旨大相乖謬，殊爲可異。……要之魏、晉士大夫雖遺棄世事，高唱無爲，而又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柔媚處世務爲自全的作法，終使儒家「忠義」的價值衰微不振，而儒道的出處之義亦在晉人會通兩端的玄智及權用下，失去了各自安頓其義理歸屬的定位。依此看來，余氏對易朝做官者多有疾辭，以爲不忠，尤其是魏晉名士內有利己之私，外搏浮世之名，處大官之貴，敗天下之大德，卻爲世所重，難怪爲余氏所不平不齒，他力持忠君愛國與盡責執事的態度，自無法接受魏晉名士周旋於政權之兩端，以求自全之道甚至謀取更大利益的作爲，或身在魏闕而心尚玄遠即在官無官官之心的表現。魏晉士人在出處進退上所表現出來的思想與生命型態，已非先秦儒家與道家所能籠罩涵括，但在余氏不明出處、不見忠義的訴求下，自難賞魏晉士人之殊妙，不過也進一步突顯了方正不阿的人格價值及儒家強調出處之義的重要性。

「嵇康—阮籍—山濤」是魏晉竹林名士的關鍵人物，余氏議論三人高下，忠魏與否成其重要判準。他如漢魏之際的王祥，[55] 魏晉之際的傅嘏，[56] 也都在易代之際，取新捨舊而受到余氏嚴厲的指責，余嘉錫歷經民國以來的內憂外

戀祿位，不能決然舍去。遂至進退失據，無以自處。良以時重世族，身仕亂朝，欲當官而行，則生命可憂；欲高蹈遠引，則門戶靡託。於是務爲自全之策。居其位而不事其事，以爲合於老、莊清靜玄虛之道。我無爲而無不爲，不治即所以爲治也。《世說新語箋疏・言語・ 18 ・箋疏 1 》，頁 80 。

55 嘉錫案：「胡氏之論王祥是矣，若其以祥之不拜司馬昭爲可尚，則猶未免徇世俗之論而未察也。考其時祥與何曾、荀顗並爲三公，曾顗皆司馬氏之私黨，而祥特以虛名徇資格得之。祥若同拜，將徒爲昭所輕；長揖不屈，則汲黯所謂『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之意也。故昭亦以祥爲見待不薄，不怒而反喜。此正可見祥之爲人，老於世故，亦何足貴！五代之時，郭威反，隱帝被弒，威縱兵大掠。然見宰相馮道，猶爲之拜。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若道之所爲，豈不更難於祥？然後人不以此稱道而笑罵之，至今未已。則以歐陽修作傳極詆道之無恥也。魏晉之際，如王祥等輩，皆馮道之流，其不爲人所笑罵者，亦幸而不遇歐陽氏爲作佳傳耳。」《世說新語箋疏・德行・ 19 ・箋疏 1 》，頁 22 。

56 嘉錫案：「嘏先與荀粲善，粲者，荀彧之子，知名當世。傅子又稱嘏與會及何曾、陳泰、荀顗、鍾毓並相友善，蓋在司馬氏得政以後，以黨援相結納。然則嘏之取友，因名與勢以爲離合者也。」《世說新語箋疏・識鑒・ 3 ・箋疏 1 》，頁 386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患，有感於時局的動蕩不安，尤其是置身在淪陷於日寇之手的北平期間，耳聞目睹部分意志薄弱者爲了保有富貴，不惜投靠敵國的可恥變節行爲，因此他面對漢魏與魏晉的易代之事、五胡亂華的永嘉之事、乃至權臣亂政篡位的不恥作爲，情感的衝擊尤爲強烈，遂援引其博覽之史傳論贊，或發抒其家國之憂，或寄憤於失節無恥之臣，使失國的魏晉名士作爲其引以爲戒的歷史記憶，在淪陷區的不仕日僞政府及對國土淪喪的悲憤之情，更加深余氏透過箋疏《世說新語》以力拯時弊、勸導世人的用心。可見，余氏對於魏晉名士「不明出處、不見忠義」的反省，對於不仕二主、不仕新朝之忠臣節士的稱揚，從而對在新朝爲官之失節者進行辛辣的諷刺，對依違兩端若即若離以明哲保身者予以深切的苛責，皆是有感於魏晉士風之不競、亡國之可悲，而彰顯史學之眞諦即在「勸戒」，以匡正世風，召喚出民族大義的靈魂，都是深受傳統正統論史學與當代國粹主義史學之影響使然。

檢視余氏對魏晉「與世委蛇」者的評斷，尤其是竹林七賢的阮籍與山濤，筆者認爲的確有重新檢討的必要。阮籍生命之精彩除得力於一己殊異絕俗的才情及積蘊於此詭譎的政治情勢之外，亦植根於老莊「情眞」的思想本源，故其「與世委蛇」應俗之跡的表現，必當連結其「不失其眞」的精神向度來掌握，阮籍任眞不羈又委蛇矯作，既「近於狂」又「近於狷」，時而有「憂喜不至」的約情藏色，時而展露出「盡哀」、「慟哭」的任性肆情，可謂兼有著糾結難釋的執迷與揮灑自如的清醒，然也正因爲這種依違難定的矛盾與衝突，故得以揮灑出〈詠懷詩〉這般晦澀多義又曖昧難解的藝術神品，此絕非余氏僅以政治現實之視角所能涵蓋掌握的。至於山濤，若依據當時諸人的品鑒語亦可勾勒出山濤的人格向度與文化義涵，如裴楷以「如登山臨下」形容其「幽然深遠」，王戎以「如璞玉渾金」稱美其器難名，顧愷之視其「淳深淵默」，而使人「莫能稱謂」，王衍所云正顯其「不居」與「闇合」之妙，即顧愷之「有而不恃」之類，都可見在諸人眼中的山濤即是一種涵融道智的表現，實暗合老子「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莊子「處於材與不材」之體道人士的生命向度，若未能明此而不解，便易以「吏非吏，隱非隱」鄙之，而不知此乃體玄識遠與避禍自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深智使然。[57] 余氏純粹從政治避禍免難的視角論斷之，又處處以儒家立場爲其價值之依歸，如此勢必對「與世委蛇」的阮籍與山濤流於主觀、片面又偏頗的批判，僅視之爲全身遠害之苟且偷生者、善於逢迎之柔媚處世者，反而未能眞正照應到歷史人物在文化脈絡裡的整體圖像。

四、綜　　論

本文藉由余氏《世說新語箋疏》之甯武子的提點，一則從宋儒朱熹「不避艱險」的理解線索轉進余氏「方正不阿」的人物論述，依此我們看到朱熹所揭示之甯武子「不避艱險」的人格型態與余氏所關注魏晉之「方正不阿」的生命向度，實具有其文化血脈相承之處，不過卻與《世說》所呈顯的方正人物言行之衆多面相與關照視角不盡相同；二則從魏晉人所揭示之甯武子「佯愚晦智」之理解線索轉進余氏「與世委蛇」之人物論述，並從中勾勒出魏晉人由「佯愚晦智」之人格型態走向「遺事無累」之生命情調的發展，透過余氏感時憂國之文化意識及高揚儒家忠義價值的檢視，他對於魏晉「與世委蛇」之人物論述的原委與得失亦昭然若揭。這兩條依甯武子之愚的不同詮釋所開展的人物論述，在進一步對照交會之後可以呈顯出何種學術意義？筆者乃透過三個面向來加以綜論之。

（一）余嘉錫以宋學精神對治魏晉文化的反省

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每寄託其感時憂國的生命情懷，指出魏晉士風萎靡不振的流弊，並批判其溺於道家、天師道[58]及釋家的危機，以表彰儒家思

---

[57] 可參拙作《魏晉玄義與聲論新探》第四章〈「癡」與「晦智」——從《世說・賞譽》「王湛隱德」一則論起〉（臺北：里仁書局，2006 年），頁 120-121、123-125。

[58]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39・箋疏 1》：「東晉士大夫不慕老、莊，則信五斗米道，雖逸少、子敬猶不免，此儒學之衰，可爲太息！」，頁 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想匡世勵俗之用心，故在魏晉新時尚所宗之任誕、雅量的人物風潮下，猶特標剛直方正之人，並強調「方正」的道德意義，主張《世說・方正》所列舉之方正人物僅周顗、溫嶠、鍾雅等可當之無愧，觀其所重乃在亂世中不避艱險、耿介不屈的忠臣節士，認爲他們有別於智巧之士的保身遠害，而能於危急存亡之際，行所當行，言所當言；除此之外，余氏亦另標舉在適性任情之玄風流行下，依然能勇於針貶士風之弊，進而訴諸正論的有識之士，以表彰他們不隨波逐流又能力挽狂瀾的堅定意志。余氏箋疏此書時，正當國家多難、剝久未復之際，又深深浸潤在傳統史家對於王朝「正統性」（合法性）與忠君愛國觀念的高度重視，強調當以民族氣節爲重，道德爲上，而與日據之僞校無形中涇渭分明，互不往來，[59] 這種歷史意識不僅流露在余氏對於竹林七賢的評價上，更豁顯在他苛責〈識鑒〉、〈賞譽〉、〈品藻〉之失當，[60] 及嚴格貞定「方正」人格的品位上，由是抑此——「與時浮沉的名士」、「亡國之罪人」，以揚彼——「守正不阿的儒者」、「興國之功臣」，遂成爲余氏通貫全書的核心訴求，與他在討論甯武子之說時抑魏晉而揚宋儒的潛在觀點正可以相互呼應。在此脈絡下，其價值判準遂建立在可否能心繫家國之興亡、可否能端正士風之澆薄，乃至人物之心跡言行表裏可否能內外一貫的要求上，由是「方正」之品評豈容名過其實或溢美失眞？余氏爲《世說新語》人物樹立「道德」指標，注入較多的道德色彩，〈方正〉尤然，由是褒貶鮮明、善惡分判，秉承的正是傳統春秋大義的史家精神，故視《世說新語》爲一本道德教科書，不論人物言行之正反善惡，皆可作爲其傳達歷史文化精神及道德人格教育的重要素材。

經由余氏有關「甯武子」之案語的提點，在「宋儒朱熹—魏晉人」與「余

59 參見周祖謨：〈余嘉錫先生傳略〉，收入《余嘉錫文史論集》，頁 666 。

60 余氏有云：「晉人之賞譽，多不足據；如殷浩者，可以鑒矣！」《世說新語箋疏・賞譽・ 99 ・箋疏 1 》，頁 476 。余氏又云：「此篇所載，雖未必皆然，然觀其賞譽人者，如鍾會、王戎、王衍、王敦、王澄、司馬越、桓溫、郗超、王恭、司馬道子、殷仲堪之徒，並典午之罪人。被賞譽者，若樂廣、郭象、劉輿、祖約、楊朗、王應之類，亦金行之亂賊。則其高下是非，又惡可盡信哉！」《世說新語箋疏・賞譽・ 1 ・箋疏 2 》，頁 415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嘉錫—魏晉人」的對應下，筆者想要進一步指出余氏箋疏《世說新語》乃是以「宋學精神」對治「魏晉文化」使然，在此立場先導下，勢必造成余氏與《世說新語》格格不入而難以契合的問題，而本文依余氏提點所揭示之甯武子的理解進路，體現的正是宋學精神與魏晉文化的對話，在此所謂「宋學精神」，實有別於一般所謂形而上的心性命理之學，當指宋學中以綱常名教爲核心，即重氣節、尚名檢、明是非、辨心術，有以天下安危興亡爲己任的精神，[61] 余氏承繼的正是這種植根於儒家思想底蘊及歷史價值使命的文化意識。而「魏晉文化」乃是兩漢著重於群體秩序與人倫教化的反動，在魏晉人個體自覺的風潮下，經由才性的發露，更強調「美趣」與「智悟」的人生情境及生命格調，由是而有超越名教、歸返自然的價值向度。余氏每標舉肯認「方正不阿」的道德、嚴厲批判「與世委蛇」的不道德，遂揚方正不阿之德、抑與世委蛇之流，「道德」便成他論人的重要基準，其實就魏晉人而言，「方正不阿」及「與世委蛇」都具有其人物類型的意義，或透顯出一種耿直不阿的個性氣質，或流露出一種難測之高識深智、從容周旋的生命姿態，皆值得欣賞品味，其間卻未必存在著人格之高低優劣。依此可見，余氏對於魏晉人以「佯愚晦智」、「韜光潛綵」來理解甯武子當是心存批判貶抑的，因此勢必將魏晉人理解甯武子的思想背景，排除於儒、道之外，而視之爲魏晉人曲解儒家經典以自立新解或爲求開脫之說，實與宋儒朱熹之觀點若相彷彿，故縱使余氏博大精贍，補正史料功不可沒，然欲以宋學精神對治魏晉文化仍存在著無法跨越的鴻溝。

---

[61] 檢視目前學界關於「宋學」的討論，多聚焦於經學史上的漢、宋學之爭，研究成果甚夥；然直至錢穆治清代學術史時拈出「宋學精神」爲主旨，方使得宋學除了經學史上的意義外，其他面向的內涵得以透過「宋學精神」的標舉被彰顯出來。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1987 年版）上册引論部分，頁 1-21。大陸學者陳勇即點明：「錢穆屢屢道及的宋學、宋學精神，實際上就是宋明儒提倡的學貴經世明道，講求義理，以天下興亡爲己任的精神。」見陳勇：〈「不知宋學，則無以評漢宋之是非」——錢穆與清代學術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 年第 1 期，頁 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從人物代稱到經典詮釋之學術進路的啓示

余氏有關「甯武子」此一案語的拈出不僅可使「人物代稱」與「經典詮釋」之間形成一有趣的連結，亦頗能回應近年來中文學門相當熱門之「經典詮釋」的議題。「人物代稱」，乃是透過借代古人以喻今人的表述模式，這原本僅是人物品鑒中的一種語言現象，相較於所喻之今人，作爲借代之古人其實只是旁枝的陪襯角色而已，然由於此「人物代稱——甯武子」在不同之時代與思想的投影下，具有形象義涵上的轉化，因而可以承載出不同時代的文化特徵與思想殊趣，尤其是「人物代稱」每從歷史與傳統上知名之人物轉來，因此向來富涵文化義涵，經由人物形象的親切體現，往往比純粹之抽象思想觀念更能契合中國人具體性思維的特徵，也相當能符應中國文化的心靈想像，因此這種存在著義涵演變的「人物代稱」便不容忽視，因爲他如實地穿索在歷史變遷與價值轉換的土壤上，看似邊緣配角，但如果我們透過他的穿針引線，甚至有可能反客爲主，成爲轉旁側爲中心的關鍵所在。

從本文「甯武子」之具體釋例，可以發現涉及歷史人物的評價及論述，若關涉到儒道之經典或注疏者，每能產生一種「探源」與「察流」之脈絡性的理解效應，特別是像《論語》這般影響深遠又廣爲流傳的核心經典，一直是歷來文人反覆把玩、一再關注的焦點所在，而經典注疏便是這些讀書人流覽的印痕鴻爪，配合著史書或筆記類的文獻，無形中可以發現彼此之間烙印著類似的時代記憶與文化想像，尤其在中國漫衍的思想文化之長流上，「人物代稱」若能收攝進而投射出不同時代的價值關懷與文化義涵，就是一條可以嘗試闢土拓荒的學術進路，因爲綰合人物與思想的研究，一則可使思想之探索不會掉入純粹抽象之哲學觀念的推衍，二則亦可在歷史與思想的洗禮下，深化人物論述的層次，這是筆者樂見的一種學術新向度。余嘉錫是一位博覽群書、多聞強識的目錄學大師，因此信手拈來即見精彩，筆者認爲當今檢索資訊的功能大增，可以更有效地展開複雜文獻的搜尋工作，但仍必須倚賴敏銳善思的文化心靈及多重向度的人文視野，否則再多的文獻也只是視而不見而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另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雖以「人物代稱」作爲一種學術進路的展示，但綰合人物與思想的研究，卻不必以此爲限。筆者讀《晉書・王戎傳》，提及「（王）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62] 王戎理解下的蘧伯玉，便大不同於孔子所稱賞「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的蘧伯玉，孔子所表彰的是蘧伯玉在出處進退上比義行權的作爲，體現的是儒家用行舍藏的「時」、「中」精神，而魏晉文化情調下的蘧伯玉，所謂「與時舒卷」則實與魏晉人「與世委蛇」相類，可以視爲魏晉人所理解甯武子之義涵的輔佐旁證，嚴格說來這個蘧伯玉的例子僅是王戎所慕，並不符合眞正之「人物代稱」的形式，但卻仍可以折射出這個時代對歷史人物的不同回響，可見透過「歷史人物」來進行思想文化的探索，未必爲「人物代稱」所框限，如同王戎之於蘧伯玉，爲人欣慕之對象的人物義涵有所轉移亦是可以進一步連結的對象，因此「人物代稱」僅是筆者綰合人物與思想之研究面向中的一環，在如此重視歷史人物與經典注疏的文化傳統裡，我們有必要重新關注「人物」乃至「人物代稱」在經典詮釋之面向上所能開顯的意義，如此或可翻轉以往論述視域的窠臼，爲經典詮釋尋繹出另一條十分值得開發的康莊大道。

（三）「方正不阿」及「與世委蛇」在中國思想文化脈絡裏的反思

儒家雖沒有直接以「方正」爲德目的論述，然觀《論語》所謂「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子張）、「直道而事人」（微子），《孟子》所謂「義，人之正路也」（離婁上）、「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盡心上）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之大丈夫的論述，所體現的即是一種守死善道的方正人格，尤其在極度惡劣的環境下，儒者每知其不可爲而爲之，遂能展現出「松柏之後彫也」（子

[62]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43 ，頁 1234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罕）的韌性與堅持，如同孔子評論史魚所謂「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衛靈公），史魚這種直道而行、義無反顧、不可妥協的精神，正是剛毅不屈的儒者形象。觀之《世說》方正人物的言行，固然也有此人格向度的發露，然孔孟所著重之方正，並不在其言行表現上，更關鍵的當是支撐此言行背後的「道德仁義」，可否是取諸天理人倫的大公大義，尤其是對爲政者訴諸一種德治的期待，所謂「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子路）、「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子路）。相較以觀，魏晉之方正人物，乃著重在不畏不屈所表現出來之有稜有角的個性，洋溢著「個體性」之氣稟的特徵，而非他們所修持的道德涵養，這種跳脫道德價值視域，而純粹就人物本身之言行風采予以品味欣賞的觀人向度，遂使魏晉人得以各展其妙、各如其味，體現出各種不同的人物風貌。余氏則特取忠直耿介、不阿無畏的愛國者以言方正，並賦予較高之道德人格的評價，實與魏晉人著力於各種其所謂之「方正」形象的生動傳寫有別。

「委蛇」在《莊子》而言，是一「接物無心，委曲隨順」之應物處世的態度，[63]即指至人之成道者虛己至極而讓道源緜不絕地湧生流衍，乃能如道般生養萬物而不有不宰。這種虛己忘懷，隨波而流，與世俗處而能和光同塵的表現，便是「委蛇」，道家這種委蛇之處世法，乃是經由心齋坐忘之功夫不斷圓熟所體現出來無彼我、無內外、無高俗、無是非而通體沖虛和融的道境，故能高不離俗、不譴是非，與世俗處而不失其眞，非但不失其眞，還能令萬物皆還其本眞，自然達到應帝王的境界，可見必須有極深極大的修養工夫方能至此。而魏晉人崇尚老莊之道，更擷取此委蛇之智術以委曲隨順的樣貌來對治亂世之無常，使他們能於詭譎政治中與世周旋，在周旋中去其稜角，虛懷順勢，以包容現實中的不完滿、不合理、不正當，並從此現實之勢的聚散流動中預知禍福，進而避害保身，此即「深智」，因此「深智」從委蛇之智術來，遂成爲一

63 〈應帝王〉云：「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庚桑楚〉云：「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以上見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頁 304 、頁 785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操御時流的無上能力，而爲魏晉人所歎賞；「委蛇」尚有「寬舒自得」之意，[64] 亦即在操御隨順時流中，由此深智之故，能夠不驚慌失措，反而展現「與時舒卷」的樣貌，在變動中仍然維持生命的從容自得，甚至放達任性以契自然，用這種仿莊子的委蛇所創造出來的生命姿態，遂能容此世間的安與不安，得與不得、順與不順，至於道德的應與不應，義與不義，亦非他們所掛懷。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適逢國難當頭，因此他主張漢賊不兩立，尤痛恨當時與世委蛇、背叛祖國的取巧之士，他以這種心態投射於魏晉時代，最不能容忍「與世委蛇」之流，遂對之採取一種嚴厲的道德審判，認爲他們苟安偷生，僅圖私己而罔顧道義，在此道德的視域下，自然無法眞正欣賞魏晉人「與世委蛇」的處世深智與生命姿態。魏晉人之「與世委蛇」，起始便偏向一種應世之術，乃名士高識深智的表現，由是形成一種從容無違、自在無礙的生命情調，可見魏晉人已褪去道家透過越俗返眞之工夫實踐以突破人之質限的進路，卻直接訴諸玄智以冥合兩端或經由性情以得意會心，進而表現出周旋於高俗、仕隱、進退、出處的生命型態。

綜而觀之，儒道兩家，一偏「方正」，一偏「委蛇」，是這兩種人物類型的思想母源，然儒道於生命是整體的關照，因此其彰顯的人生智慧固然各有所擅，卻未必相互衝突矛盾，在人生的路上尤需要儒道雙修、德慧相輔，甯武子之得以游移於儒道思想的視域，即顯現出儒道思想之間具有相互對話、彼此涵融的微妙關係，正是探深人物論述的關鍵所在。儒家挺立剛健之德業，卻不忘輔以「退一步」的人生智慧，只是「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無適無莫」一則表現出儒者無「意必固我」的偏限，但「義之與比」則強調儒者以道義爲價值依歸的本懷，是以「可以權」

64 〈至樂〉云：「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攸，隨行列而止，逶迤而處」。成玄英疏「逶迤，寬舒自得也。」見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621-622 。王叔岷《莊子校詮》（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8 年）〈至樂〉：「委蛇而處」，成疏：「逶迤，寬舒自得也。」案成所見本「委蛇」作「逶迤」字異而意同，頁 655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變通必須建立在「可以適道」的根基上，因此沈晦之智，亦必須依附輔翼於「正道」之下；道家表彰柔順之智，不過其本懷仍是不失其眞，方而不割的。在魏晉這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文化關懷下，魏晉之「方正不阿」及「與世委蛇」可以說已跳脫出儒、道原有之格局，而表現出充滿魏晉文化殊趣及時代精神的生命形態，本文透過魏晉之人物論述的探索及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的檢視，也使我們在儒道之思想與文化的發展上窺見：若非立足於道的根源，道家則會流於表相，顯得輕薄；若沒有立足於道德本心，儒家也會走向教條，顯得僵化，這一部分仍有待進行進一步的關注與反省。

（責任校對：陳建男）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臺北：廣文書局，1977年）。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年）。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9年）。

王叔岷：《莊子校詮》（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8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近人論著

吳冠宏：《聖賢典型的儒道義蘊試詮・乙篇「甯武子——儒愚與道愚」》（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

吳冠宏：《魏晉玄義與聲論新探》第四章〈「癡」與「晦智」——從《世說・賞譽》「王湛隱德」一則論起〉（臺北：里仁書局，2006 年）。

吳冠宏：〈余嘉錫以史評進路箋疏《世說新語》的現象考察〉，《東華漢學》第九期（2008 年 12 月）。

周祖謨：〈余嘉錫先生傳略〉，《余嘉錫文史論集》（長沙：岳麓書社，1997 年）。

陳　勇：〈「不知宋學，則無以評漢宋之是非」——錢穆與清代學術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 年第 1 期）。

馮承基：〈論魏晉名士之政治生涯〉，《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二卷，第二期。

錢　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1987 年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